

《裂瓷》:

平静而内敛地讲述生活之疼痛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读了俞妍的小说《裂瓷》，首先是觉得作者非常有才气，语言很成熟。她所表现的主题，大都是人物在压力下的不自在的生活。小说里面的世界，有太多的苦痛，人物的内心被折磨得千疮百孔。作者敢于直面生活的残缺，并将难以言说的孤独和绝望细致地写出来。而且，还能写得平静而内敛，写得耐心而细致。但也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小说的叙事很吸引人，但是在处理人物的冲突关系的时候，就缺乏一种深度，在表现对小说主题的理解的时候，也有点不了了之。比如说，《游戏》隐隐约约透露出妈妈跟堂哥之间的关系，有性虐待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到后面，孩子却忽然莫名其妙地认为，爸爸对妈妈的施暴是一种游戏。作者没有抓住一个小孩心理的真实状况，因为，一个小孩不可能把大人之间暧昧、微妙的，甚至充满了这种非常危险的关系看作游戏。作者没有把人物关系的真实、残酷甚至最深刻的东西开发出来，所以就只好这样不了了之。作者是把自己的想象加在这个小孩的头上了。

同样的，《橘子灯》也写了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体验的情感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是，随着妻子的去世，男主人公的精神无家可归，没有了归属感。最后，写到病房里面挂着橘子灯，而且在床头轻轻地晃荡。作者试图写出一种人性的温暖，写出生活中的希望感，但这是不自然的。从文体上看，就是一种文艺腔。

我认为，作者要深化描写，要深入下去，将人物心理的客观情状写出来，而不是停留在外在的主观化的层面。

还有，题目也显得有些简单化，比如说《葬礼》《回家》，这些词太平常了，很容易跟别人重复，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小说的题目，非常重要，像人的眼睛一样重要，所以，一定要传神、别致，耐人咀嚼，使人难忘。《红楼梦》就是一个意象，《红与黑》和《罪与罚》这样的书名，就可以深刻地概括小说所表达的内容和主题。《白鹿原》“白鹿”是一个意象，“原”是一个意象，加起来显得新鲜而别致。鲁迅先生的《祝福》这个书名就包含着丰富的反讽意味。小说的书名，《青烟》和《橘子灯》有点意味，其他的都很俗，很苍白，淡而无味。给作品命名，包括给人物命名，皆非细小事体，也很考验一个作家的修辞能力。

《鲜艳与天真》:

田园诗般的乡村浮世绘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首先我想致敬浙江“新荷计划”，因为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几年过去，这个计划越做越好。推介“新荷”青年作家，坚持下来，就是造就一个群体，犹如浙江省的文学体校，功莫大焉。简儿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记得第一届读的是她的一组散文，这次读的已是散文集《鲜艳与天真》了，简儿也成长为深得嘉兴大众读者欢迎的专栏作家。读完作品，我想说：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散文集60余篇短章，是她一如既往的田园诗，一幅幅遍地应答的乡村浮世绘，笔调温婉、善意、灵动，令人心生欢喜。她的写作颇受泰戈尔、冰心，还有汪曾祺的影响，始终以爱的哲学书写小生活里的小世界，以及过去的光阴里，她的爱与小欢喜。全书五辑，分别状写儿时故乡的记忆，她生命中影响过的人物，还有农时、农事、农物，最后一辑是散文诗，一物一念。简儿是唯美而简单的，她拒绝一切阴暗的东西，一如她的笔名，简单到一文一事一物一念。这使简儿的写作有两面性：因为偏爱小忧伤，拒绝大痛苦，就使她多少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与笔力。今天的乡村巨变，当然也会伴生疼痛，但在简儿笔下常常是点到为止，豆腐坊的断腿男主人，对妻子的出轨半闭双眼，静默中只能一村搬到另一村。可是他为什么瘸腿？爆米花的男人、穿耳洞的春香奶奶、捕蛇人等等，还有严寿得产后抑郁症的妻子，她的抑郁来自何方？她的自杀给了严寿特别对孩子怎样的伤痛？等等，这一切都少了追问。如果多些对现实的关照，就会多些厚度、活力与重量。

散文是自由自在的性情之文，文体和语言都可以开放，简儿选择了平和冲淡。平和冲淡的文脉，泰戈尔爱的哲学，毕竟有哲思在；哪怕周作人，也有苦涩；汪曾祺的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这个淡是大味至淡，是真，也是浓。或者说，这个淡是世故到了天真，最浓的人生滋味。简儿写父亲的篇什《鲜艳与天真》，就缺乏这个浓度，鲜艳是月季，天真老父亲被误读的笑脸，父亲不能出门与工作的伤痛与无奈，被冲淡与浅化了。这需要作者把对生活的洞悉与发现，转化成自己的叙述能力。

因此作者的修为及文学态度很重要，用文字诉说生命思想和性情，必须是生命带出的，也取决于你的文学态度，期待简儿厘清现实和想象的关系，也就是实和梦，真和幻的关系，对生活的透彻观察每一个角度。当你写到他的痛并不等于没有爱，而是更深层的一种爱。期待简儿向自己挑战，进行有难度的写作，铭记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能在小生活里写出一个大世界。

《寻找绿目乐队》:

“反”的美学气质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读赵挺小说的时候会想到王朔和王小波，而且我现在赵挺的一篇小说中直接把王小波

浙江“新荷计划”再结硕果

——“2018新荷文丛”研讨会纪要

浙江省作协五年来实施“新荷计划”，团结培养青年作家，有效地做到点面结合，部分青年作家在文坛上已渐成气候，形成新一代的“文学浙军”。2018年，“新荷文丛”共出版了赵挺、俞妍、简儿、蒋离子、方晓、啊呜、张嘉丽、羽并缺一8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集，近日，“2018新荷文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评论家与青年作家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有效交流。



当成讨论对象了。这些其实构成了赵挺小说美学的一个源头，当然这其中又稍有区别。王朔在解构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严肃的，他用政治的语言来解构政治，背后有很纵深的当代史背景。王小波则是通过很智性的逻辑来完成对既有历史结构和语言结构的颠覆，在王小波那里，反讽被使用得无痕迹又别出心裁。那么赵挺用的是什么方式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在1970年代到1980年出生的作家群体中，赵挺这样的写作并不多见。我昨天去百度搜索他的资料，非常少，但是看到一个评论，说赵挺、胡坚、阿乙并称“三杰”。阿乙我认识，他的写作比赵挺更加冷酷和残酷。如果要用一种“一本正经”的语言来描述赵挺的“一本不正经”，有点不对称。我后来又看到吴玄的一个短评，他认为赵挺的小说《南方，慢速公路》，基本上是一个“反公路小说”，里面有公路小说的全部因素，但是同时又对之进行了颠覆和重写。我从吴玄这里得到一些启示。

赵挺的语言结构和句法结构非常有意思，他的句法结构和语法结构里面有一个否定性的东西，有一个前缀和后缀。前缀就是“他妈的”，《寻找绿目乐队》里这个“他妈的”反复出现，这并不是一句脏话或者说日常的语言，这个语言引进到这个作品里面，构成了“否定”的前缀。作为记者的女朋友每一次要报道寻找乐队故事的时候，她的标题基本上就是“诗和远方”。但是每一个标题主人公都要求加上“他妈的”——“他妈的诗和远方”——加上之后，一种陌生化、颠覆性的力量就出来了。

后缀主要是反逻辑，这个反逻辑特别的有意思，比如其中一篇里面写到主角“我”和西瓜约会，西瓜说你现在看着我，你到底是喜欢男的还是女的？主角的回答是“我喜欢车”。这个回答把日常语言的逻辑颠覆掉了，而对语言的颠覆其实也是对一种常见的观念的颠覆。赵挺在作品里面使用了大量的反逻辑思维，不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来推行故事或者说展开人物的描写。如果让我用一个词去描述赵挺作品的时候，就是“反”。我觉得这不是一部作品的“反”，或者说一个类型的“反”，而是整个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美学气质。这个“反”有很多立体的呈现，体现在细节、场景、对话、人物等各个方面。

《沉水香》: 制谜与解谜者的叙事空间

曹 霞(南开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

羽并缺一的《沉水香》是一部具有江南气质的小说，它氤氲着浓重的忧郁、潮湿、朦胧，把我带入了具有地域和文化特质的氛围里。作家和所处的地域有着紧密的关系，是一个相互滋养和相互塑造的过程。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有明显的特征，就是“制谜与解谜”。作者一开始就在制造谜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谜语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叙事的空间。小说开头是关于“水粉香”的描写，它是“女鬼身上附着的浓香”，这个谜语又是一连串谜语的开端。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强悍但却模糊，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符号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表征着外面的世界、彼岸的存在，对此在和当下构成了一种

同时失踪的还有家里的木匠。小说通过新闻、民间传说、八卦消息架构起了沈月如的故事。

与此同时，现实中的谜语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它的主人公是辛远。他收到神秘信件，写信人提示自己与他有过前尘往事，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汤一友和吴昕在辛远的生活中时隐时现，总是带来意外状况，也不断加入新的元素。

小说的叙事线索繁多维：它关乎鬼魂，又关乎人间；它写多年前的恩怨纠葛，又掺杂着当下的爱欲执著。作者用两个大谜语交错搭建起小说结构，不停地制造谜语又一个个解开谜底，通过神秘紧张的情节不断将谜语朝向人性深处推进，每一个谜语都是人性的考验与两难，提示我们在人世间会经历的种种诱惑、努力和痛苦。在小说最后，作者解答了所有的谜语，呈现出了人性之真之善之难。祖孙两代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深深地陷入了爱欲和利益的深渊里。

小说以令人悚然的“鬼故事”开始，以人物的死亡和发疯结束，荡气回肠之处也令人扼腕叹息。它引领着读者一步步走入故事深处，小说的完成度很高。在此，我有一个问题与作者商榷，就是小说里的谜语过于稠密，比如吴昕和汤一友共同爱着辛远的女友颜谁。我觉得这个谜底来得有点陡峭，类似这样的枝蔓可否砍掉一些，让叙事更紧凑。

从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来看，作者有想法，也下了很多功夫。作为新荷计划的新锐成员，她已经显示了走向成熟的功力。

《失语者》: 书写情爱的多重面相

傅逸尘(《解放军报》评论版主编):

张嘉丽的小说集《失语者》，题材较为集中，讲述的都是关乎男女情感的故事。虽然聚焦的都是男女之间的“战争”或曰对抗性关系，但是每一篇都写得不一样。从历史到现实，从都市到乡村，写出了男女情感的多重面相。冷硬、淡漠、决绝，隐藏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背后的，是精神的孤独和心灵的疼痛。

小说中充盈着很多动人的细节和绵密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使得张嘉丽得以穿透故事矛盾冲突的表象，探触到男女情爱的深层肌理，尤其是那些幽暗深邃的心理空间。事实上，无论是《三妻四妾》中男人变态的情欲，《被囚禁的女人》里女人的刚烈、绝望，还是《一只优雅的猫》中妻子微妙、难解的复杂心理，张嘉丽笔下的男女人物经常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态的极端经验。这种对极端经验的迷恋，使得作家得以超越日常经验的庸常和琐碎，试炼人性和情感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通常直接来自外部世界，她的多篇小说中都闪动着军人的身影，由此产生的异质性经验，打破了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逻辑，也敞开了人物情感世界和精神存在的表现空间。

张嘉丽或许并不擅长对外部世界做横向的拓展，但是她执著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纵向剖析。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强悍但却模糊，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符号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表征着外面的世界、彼岸的存在，对此在和当下构成了一种

入侵、挑战和威压。这种力量直接改写了日常生活的秩序，甚至深刻影响了女主人公的命运。张嘉丽恰恰是要由此打破某种生活的定见，重新建立一种审视男女情爱的视角。这种视角局促、晦暗、逼仄但也内敛、尖利、深沉。小说剧烈的矛盾冲突，反衬出女主人公平静、坚韧的心灵世界，巨大的反差间，蕴含着生活的痛感和命运的无奈。

《失语者》中，当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不同的人都采取了相同的立场，那就是冷漠、沉默。这一过程在张嘉丽的笔下，冷硬、残酷，但却不失真实、客观。作家屡屡以新鲜甚至带有某种病态的视角表达出对日常经验的别样理解，显示出女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和独特。

通常来说，作家的写作主要依靠观察、经验和想象。当日常生活经验越发泛滥、贬值，并越来越难以为小说叙事提供营养和支撑时，观察生活的视角便显得越发重要。对于当下的青年写作来说，“写什么”的焦虑正在超越“怎么写”，而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张嘉丽的写作题材单一、幅面狭窄，也同样要努力突破这重瓶颈。如何跳脱小我的私人经验，介入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对于青年写作是迫切的、有难度的，也是必须的、重要的。

《失语者》中，当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不同的人都采取了相同的立场，那就是冷漠、沉默。这一过程在张嘉丽的笔下，冷硬、残酷，但却不失真实、客观。作家屡屡以新鲜甚至带有某种病态的视角表达出对日常经验的别样理解，显示出女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和独特。

《万物清癯》: 诗歌之光映照一枝一叶

谷 禾(《十月》杂志编辑):

读啊呜的诗集《万物清癯》，我首先注意到“清癯”这个词。我的意识里这个词更多是用来描述睿智的中老年人的，像南怀瑾、姜子牙等仙风道骨模样的，可以为这个词代言，而不是如来佛或释永信那类的油腻中年男。所以啊呜用它来定位万物，这里有一个诗人的立场在，包含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取舍。

这本诗集是与众不同的，不像我喜欢的杜甫、曹操、黄仲则、艾青、穆旦等人的诗歌都有着强烈的社会性和人世精神。啊呜的诗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更专注于写自然的一枝一叶在内心的映象。我们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个情字在啊呜这儿却平静如水，激起的只是涟漪。他的写作是朝向自我和内心的，追求一种“超出生自身的感知和经验”，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现实的狰狞和内心的温柔”之间的平衡。有独特的美学追求，才会逐渐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这点上，啊呜是自觉的。

比如《朦胧的黎明》是一首回忆之诗，她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这个孩子一早起来，一边数数一边观察一家人的忙碌，呈现了普通人早餐时分的生活场景。这首诗的微妙在于诗人将他者的行为和孩子对事物的观察以及数数过程恰到好处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一首完整的诗。我还没有见过另外的人这样写熟悉的日常生活。啊呜敏捷地抓住了并完整呈现了出来。小缺憾是语言之外的意义单薄了一点。《朦胧的黎明》是照相机式的记录，缺少让人振奋发聩的观照。

另一首《和杜子美春夜喜雨》只有六行，却得起细读。前两节写树和花儿，刺破对应了天空的饱满。银光让黑夜显形，很严密。最后一节，

牝鹿的出现简直是神来之笔，它像一道光照见了万物。诗人巧妙地取了清癯的部分为世界命名。这样子的诗是经得起细读的。

啊呜的诗有鲜明的美学追求。他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作为同道，我也建议他能在切入时代和当下的人们的公共生活方面做一些尝试，把自己的诗歌写作再敞开些。我个人认为两者结合起来的文本会更结实，也更有感染力和穿透力。

《半城》:

浑然天成的现代都市经验

李 壮(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蒋离子有一重网络作家的身份。《半城》这部小说的结构方式以及故事设置，的确同我们杂志上最常见的传统文学作品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它的情感纯度、经验纯度都很高，小说对纯度及烈度的渴望显然要比对经验复杂性和社会历史图景展开可能性的渴望要更加强烈。但它好像跟通常我们所想象的网络文学也不太一样，不是以那种无限延展、闭环增殖的蜈蚣式结构来展开自身，而是有其较为明确的结构意识：从作者落笔的第一个字开始，她就知道自己要以怎样的速度、怎样的方式去抵达一个怎样的终点。当然，不管如何定义这部作品，总归有一些东西是文学所共通的。下面就谈几点我阅读后的想法。

第一，这部小说设置了一个很强烈的冲突结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如何从相互猜疑、到相互触碰，经过一番番试探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到最后因爱而分开，一切故事都是从这个结构里面来的。这个冲突结构很饱满，那种爱与欲之间的犹疑摇摆、自我辩解，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当然，在这条主线之外，作者还埋下了一条辅线，女二号咖啡馆女老板的情感经历对主线构成了较好的补充。如果主线就是从不断的“作”里面“作”出了真爱，那么辅线的故事则更接近于生活的常规态。

第二，小说塑造了几位形象分明、性格强烈的人物。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很极端的人，是那种会得到无数人的爱、而在得到无数爱之后又会再去寻找无数+1的爱的那种人。这种人很危险，但正因危险，才真正有吸引力。这种人物的爱情故事，当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题材，但是它的确会在读者的心中激起许多神秘的震颤乃至呼应。

第三，小说对现代经验尤其是现代都市经验的书写让我印象颇深。我们今天许多作家写都市，其实是把都市作为一个景观化乃至隐喻化的符号，大量的日常经验元素堆砌其中，却与人物内心世界以及故事结构之间缺少更紧密的关联。而蒋离子这个故事及其人物，是无法从都市语境里面移出去的，都市的气息同小说人物的气息是深层契合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令人感到比较舒适。

当然，小说在具体操作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里面的人物似乎有点太标签化，文艺青年气息偏重。再如，部分情节的嵌入有些生硬、还需推敲。此外，从结构层面上来讲，一些起到了颇为重要的叙事功能的人物及线索，是中途介入而又很快不知所踪的；小说的叙事视角有时也不够统一。这些地方，在今后的写作中还可以更加注意一些。

《别把我们想得那么坏》: 荒诞浮出日常经验之表

赵 依(《人民文学》杂志编辑):

方晓的小说集《别把我们想得那么坏》在题材上有主体性，呈现了一群被迫害、被伤害、被侮辱的人和这些人无序的生活。小说集很大程度上讨论了这些群体的自尊自爱问题，他们的精神崩溃和心理冲突在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则是象征了底层生存群体的状态，因此人物都非常有符号性，比如有疾病的人，比如同性恋，比如杀人者，再比如正常伦理关系之外的血亲，等等。每一篇小说都有实的部分和虚的部分，也是现实和荒诞的两种呈现，从小说的这种叙事张力可以看出，方晓的情感倾向和先锋主义情结，他喜欢给这些人物设置极端情形下的结局，要么死亡，要么病态，要么溃散，以此抵达小说的力量感。

我也注意到，方晓的表达在控制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由于他比较喜欢用“我”作为叙述人称，有时会因为自我情感的溢出导致小说人物脱离人物的限制视域，打破文本整体的流畅感，气息显得比较凌乱。这也可能是方晓想要表达的东西比较多，情节线索比较拥挤，自己本身又极富正义感，所以一些情节略显直白，相对缺少打磨，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开头，太多的信息注入和背景交代是不太好的，再比如小说情节的推动过分依赖意外和巧合，还有对新闻素材的引用和大段议论文语的插入，这些都是可以再斟酌的地方。

方晓擅长以短句去结构情节，这种叙事方法，读者单独读一个这样的小说会觉得文本非常干净，但是读10个类似的小说会觉得缺少细节支撑和语言打磨，这实际上关系到作家处理情节的能力。当然这些并不妨碍方晓小说已经具有的鲜明的风格特点——以异质性、陌生化的荒诞经验来表达人的抗争，这种抗争既是小说人物对所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抗争，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拒斥，这些指向无一例外启发着我们去思考、探索、厘清自身面临的现实和人生价值选择问题，同时，还观照起青年写作与现实题材的深层关系。浙江青年作家创作已经展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他们在各自的文学趋向下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学特质，方晓小说里的地方经验和地域文化背景其实并不多，这说明作家创作小说时的虚构能力是非常强的，文学表达也比较成熟，这即是我们在“新荷作家”充满信心的又一实证。